

# 跨界者的跨界與虛構： 陶晶孫小說〈淡水河心中〉顯現的 戰後臺灣社會像\*

黃英哲\*\*

## 摘要

本文以〈淡水河心中〉(淡水河殉情)日文小說為中心，旨在探討中國著名現代作家陶晶孫的多重跨界書寫。陶晶孫(1897-1952)畢業於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曾參與文學團體「創造社」及「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活動。抗日戰爭期間，任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衛生研究室主任。1945年日本戰敗後，隔年前往臺灣擔任臺灣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教授，1950年4月亡命日本。1951年4月，應東京大學之聘擔任兼任講師，在文學部講授中國文學史，並展開旺盛的創作活動，受到當時日本文壇矚目。惜1952年2月因病急逝。在不到一年的文學活動中，陶晶孫遺留的日文作品多是散文、隨筆，〈淡水河心中〉是他遺留的唯一創作小說。這些日文遺作在陶晶孫逝世後被集結為《日本への遺書》(給日本的遺書)，於1952年10月出版(東京：創元社)，12月又再版，隔年3月又出第三版，在日本文壇得到相當的評價。

從陶晶孫的經歷中可以窺見其跨空間與跨文化的生活經驗，本文想藉由作者這篇至今仍未有中文譯文的〈淡水河心中〉，探討「跨界者」陶晶孫的臺灣行旅及小說中所呈現出的殖民記憶、認同想像與文化、語言的跨界議題等戰後初期臺灣社會像。

關鍵詞：陶晶孫、淡水河心中、戰後臺灣、跨界、虛構、殖民記憶

---

\* 拙文初稿曾以〈「跨界者」陶晶孫：論〈淡水河心中〉〉為題，發表於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哈佛燕京學社主辦，「交界與游移：近現代東亞的文化傳譯與知識生產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年9月10-11日。其後，經過大幅度修改，以〈跨界者的跨界虛構：陶晶孫小說〈淡水河心中〉顯現的戰後臺灣社會像〉為題，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戰後臺灣社會與經濟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年12月23-24日。筆者感謝兩次研討會的評論人柯慶明、蕭阿勤兩位教授，以及與會學者的指正。拙文投稿後，感謝三位匿名審查人的審查意見與修改建議。除了感謝上述先進外，拙文書寫、修改與資料收集過程中，特別感謝以下三位師友的指正和協助：同志社大學名譽教授太田進、埼玉大學教授小谷一郎、紐約大學博士候選人陳偉智。

\*\* 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教授

來稿日期：2010年8月2日；通過刊登：2010年12月27日。

- 一、前言
  - 二、從一件殉情事件談起
  - 三、臺灣時代的陶晶孫（1946-1950）
  - 四、致命的吸引力：當臺灣女子邂逅大陸男子
  - 五、戰後臺灣社會像書寫：〈淡水河心中〉
  - 六、結論
- 

## 一、前言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期，東亞世界在傳統帝國的瓦解與新興民族國家的興起並固著的過程中，產生了劇烈的變化。當傳統秩序的邊界面臨瓦解的同時，新興秩序的邊界也逐漸形成，從政體、社會、經濟、文化，乃至文字各層面，幾乎都朝向國民國家化的方向發展。在以國民國家為邊界的新興秩序固著的過程中，也伴隨著產生了各種跨越邊界的跨界者，正因為邊界的存在，才有跨界者的產生，同時跨界者也親身體證（embody）了邊界的存在，以及更加弔詭地，封閉邊界的不可能性。本文所討論的陶晶孫，即是這樣的跨界者，在其跨界的生命歷程中也見證了戰後初期游移在日本、臺灣及中國之間的種種跨界現象。陶晶孫一生的經歷，跨越了諸多具體化的有形政治邊界，同時也跨越了各種語言邊界，此外，在其社會位置上，也跨越了醫者與文學家的邊界。甚至在本文所分析的〈淡水河心中〉<sup>1</sup> 這篇小說中，更跨越了真實與虛構的文本邊界。在戰後臺灣被施予「再中國化」的再一次國民國家教化施作的過程中，跨界者陶晶孫以其跨越語

---

<sup>1</sup> 陶晶孫，〈淡水河心中〉，《展望》7（1951年7月），頁95-99，後收於陶晶孫，《日本への遺書》（東京：創元社，1952），頁128-138。拙文主要根據發表於《展望》的文本。近年出版的丁景唐編選，《陶晶孫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中國現代文學館編，《陶晶孫代表作》（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曹亞輝、王華偉譯，《給日本的遺書》（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皆沒有收入〈淡水河心中〉，這篇作品迄今沒有中文翻譯。

言、社會位置、文本文類的介入，在〈淡水河心中〉這篇小說中，有意無意地，除了以小說逆寫新聞事件外，也一併地描摹顯現了戰後臺灣的社會像，從其虛構的文本中可以窺見其跨界視野下的臺灣實像。

本文欲透過陶晶孫的小說〈淡水河心中〉之分析，討論其中所顯現出的戰後臺灣社會像，並進一步探討當時臺灣民眾於時代變換中的心理糾葛。〈淡水河心中〉是陶晶孫根據戰後臺灣發生的一件殉情社會新聞所改寫而成的小說，以日文發表在日本的文學雜誌上。許多關於陶晶孫的相關討論文章中並未對於此篇小說多所著墨，然而，小說中卻生動的記錄了關於戰後初期臺灣社會的種種矛盾、磨合與對立樣貌，筆者認為在陶晶孫的文學作品中，〈淡水河心中〉這篇虛構性質的小說有其特殊性不能加以忽略，透過〈淡水河心中〉，陶晶孫以小說形式逆寫了陳素卿與張白帆的新聞事件，利用虛構的方式如假似真的改寫了殉情新聞，從中再現了另一種真實。在逐漸被重重文字包裹裝飾成的新聞事件之教化虛構中，陶晶孫的虛構小說，卻又再度顛覆了殉情事件的新聞真實，並揭示了戰後初期臺灣社會的複雜圖像。

## 二、從一件殉情事件談起

1950年1月14日《中央日報》第4版有一則社會新聞，標題是「淡水河邊水門下 一少女殉情自勒 遺落兩封書信表明自殺原因 因為不能與愛人結婚」，內文如下：

【本報訊】昨天，上午六點多鐘，正是好時光，好天氣，在淡水河邊，十三號水門下，發現一個艷麗女屍年齡不到廿歲，燙髮，穿白衣貼身背心，燈心布襯衣，黑黃細花旗袍，外罩紅毛線外套，……。頸緊纏有已斷的童軍用的麻繩半條，……。在屍體的堤巔，仍繫有已斷的麻繩半根。

此艷屍係於上午六時許，經附近居民發現後，即報告迪化街派出所，呈報市警第一分局，立報地檢處，派檢察官率同法醫及書記官蒞場檢驗，係屬勒斃。同時在她身上，檢出三本書；「中國語言教授法」、「中國語言

語文學」(以上均係日文)和王西彥寫的「春野戀人」,兩封遺書,一封白信封,普通信紙寫的是給父母的,另一封是用粉紅色信封洋信箋,寫給她的愛人臺灣廣播電台張白帆的。另外一個小皮包,內有九十元新臺幣和身份證,她名陳素卿,十九歲,臺北縣人,住樹林鎮西園里新德里三十二號,桃園女高畢業。……警局根據遺書到廣播電台找到張白帆。他聽到這一消息,當時雙淚直流,趕到現場,……。

据張白帆說:他是廈門人,今年二十四歲,三十七年入閩臺日報任副刊編輯,此時陳即在該報任會計。兩人相識,張愛好文學,陳也受其影響,兩人遂漸相愛。十二月間,張到臺灣廣播電台兼任廣播員,到三十八年一月,張轉到電台專任編輯工作,而陳也因報社結束回家,但情感並不因分離而減低,兩人相愛甚熱,曾數次同居一室,仍非常純潔,而情感也因之更堅。但陳的父母,絕對反對女兒和張結婚,屢經請求及託媒,都不得許可。

在此情形下,張的朋友,以女方父母既反對結婚,長此下去,徒增痛苦,乃勸張設法結婚,以斷女念,並為介紹廣播電台女同事北平人徐冰軒認識,相認祇兩個多月,便發生了關係,因此在三十八年六月間結了婚,現在且已有孕。林〔按:張之筆誤〕徐結婚後,陳仍盼與張保持純潔友誼,時相往來,但遭到張妻徐冰軒的冷眼和痛罵,陳無可奈何,常到張的辦公處偷偷看張,以慰一片戀情。一月前並要張同她去照了一個相,此時即已決心自殺。十二日的下午,張又接到陳自樹林來的一個電話,堅請他一定於七點半的北上車到達時去臺北車站接她,張屆時到站將她接下,她說有事到中正東路外祖母家去,張陪她走到中山路口她又說還沒有吃飯,兩人又去吃了飯,她又說不想去看外祖母了,要張送她上車回樹林。兩人在候車室中,陳又重提往事,伏在張的肩上,微微輕泣。張婉加勸慰,陳要將手上的一隻錶送張,張以留下徒增痛苦,也予婉拒,但陳說機器略壞,請他代送去修,他才收下,然後她送他上七路公共汽車上班,即成永別。到十三日上午九點鐘,便忽接她已死的惡耗,……。<sup>2</sup>

<sup>2</sup> 詳細報導請參見〈淡水河邊水門下 一少女殉情自勒 遺落兩封書信表明自殺原因 因為不能與愛人結婚〉,《中央日報》,民國39年1月14日,第4版。

同一天的《中央日報》第二版又全文刊出死者陳素卿寫給張白帆和父母的兩封遺書，標題是「家庭阻擾難締鴛盟 悲憤自殺永保純潔 陳素卿致張白帆絕命書」。在留給張白帆的遺書中，陳素卿寫下：

我心愛的張：這是最後給你的一封信，但是你不要傷心，我要在這封信裏對你說很多的話，我從前都不敢對你說我痛苦，我現在都要告訴你了。……

張！我不怨恨你，我只怨恨自己的命運，恨自己的家庭，如果我父母當初答允我和你結婚，現在你也不會給那人佔去，我也不會走上自殺這條路，我怨恨我的家庭為什麼要那樣仇恨外省人，我不知道他們的前生前世是不是受了外省人怎樣的欺侮。……你教我說國語，學國文，教我怎樣做人，怎樣做朋友，怎樣孝順父母，怎樣愛祖國，怎樣努力讀書，你告訴我許多我從來沒有知道的事情，使我覺得人生是怎樣有意義，使我覺得你是一個偉大的人，很值得我來敬愛你。……

我不怨恨你，我只恨我的父母為什麼不答允我嫁你，我真恨死了，我也恨我為甚麼要有良心，為什麼不忍把你搶回來，但是我恨那個狐狸精，為甚麼把你搶去了，又不讓我和你做朋友，還要迫我去自殺呀！……張！我是永遠愛你的，如果人死了真會變鬼，等我們都做鬼的時候，你再愛我嗎？但是，張！我要你很幸福的活下去呀！

愛你的人素卿書<sup>3</sup>

另一封寫給父母的遺書寫下：

爸爸！媽媽！

我現在要和您們永遠告別了：但是，請您們不要傷心。您們把我養得這樣大了，我不能永遠在您們身邊服侍您們，這是我很大的不孝，所以我現在要走這條路心裏也是十分的傷心。……

我的心很痛，我沒有話說了，我只要求您們不要傷心，也不要害張先生，張先生是很好的人，我到死的時候也是愛他，請您們千萬不要去害

<sup>3</sup> 遺書詳細請參見〈家庭阻擾難締鴛盟 悲憤自殺永保純潔 陳素卿致張白帆絕命書〉，《中央日報》，民國39年1月14日，第2版。

他，他不是亂來的人，他說有對不起我，我們的愛情到現在都十分清白，這一點我可以對得起您們，請您們千萬不要害他吧！我也要求你們以後不要再仇恨外省人，外省人有壞的，也有很多比本省人更好的，如果素娟妹妹將來也愛了像張□生這樣的外省人請您們不要再阻止吧！最後敬祝您們健康。你們不孝的女兒素卿上。<sup>4</sup>

此則新聞與遺書登出後，市井頓時議論紛紛，繪聲繪影，成為備受矚目的一大社會事件，媒體持續追蹤報導，民眾也爭相為文、投書表示己見。<sup>5</sup> 由此事件引發的瞬間騷動中也可窺見戰後初期牽動臺灣社會的族群意識，對於新來統治階層的好感、疑懼乃至於嫌惡等複雜心理，因為此事件的發生而瞬間爆發並且持續發酵，更甚的由私人事件一轉成公眾注目的話題。陸續的相關報導中提到「在家屬們初到的時候，都悲憤交集，他們疑心她不是自殺，而是被殺。他們覺得遺書寫得那麼長，那麼好，不會是她自己寫的。警局當叫他們去找她所寫的其它文件來與遺書對筆跡，並介紹他們去見法醫，由法醫從學理上分析驗斷她是自殺的理由。」<sup>6</sup> 但旋又報導說「死者親屬消釋誤解，囑張繼續保持情誼。」<sup>7</sup> 從為文與投書的內容可以發現當時社會上不同角度的評斷與波紋，其中有從社會現實角度切入認為：一、陳素卿是封建社會的犧牲品。二、陳素卿是地域觀念的犧牲品。三、陳素卿是三角悲劇的犧牲品。至於造成陳素卿自殺的最大因素，當然是由於

<sup>4</sup> 〈家庭阻擾難締鴛盟 悲憤自殺永保純潔 陳素卿致張白帆絕命書〉，《中央日報》，民國 39 年 1 月 14 日，第 2 版。

<sup>5</sup> 〈殉情女化癡情友 陳素卿遺體昨已火葬 張白帆今日為她開吊〉，《中央日報》，民國 39 年 1 月 15 日，第 4 版；〈殉情女灰置法藏寺 致祭靈堂雖無弔唁悼聯 但有更多的眼淚與嘆息〉，《中央日報》，民國 39 年 1 月 16 日，第 4 版；讀者景白和王曰之的投書，〈陳素卿之死〉、〈看陳素卿遺書感想〉，《中央日報》，第 4 版；達妮，〈愛情，你怎樣處理？——從陳素卿之死想起一個故事〉，《新生報》（新生副刊），民國 39 年 1 月 17 日，第 9 版；〈人性的控訴：哀陳素卿之死〉（作者沒有署名），《新生報》（新生副刊），民國 39 年 1 月 18 日，第 9 版；〈傅斯年等昨發起 補葬陳素卿女士 願同此心者集其薄貲〉，《中央日報》，民國 39 年 1 月 19 日，第 4 版；音，〈陳素卿之死〉、天嘯叟鄭烈，〈弔陳素卿女士〉，《中央日報》（中央副刊），民國 39 年 1 月 20 日，第 6 版；言采薇，〈陳素卿死有遺憾乎〉，《新生報》（新生副刊），民國 39 年 1 月 23 日，第 9 版；齊如山，〈兩個理由：關於改葬陳素卿女士〉，《中央日報》（中央副刊），民國 39 年 1 月 24 日，第 6 版。

<sup>6</sup> 〈殉情女化癡情友 陳素卿遺體昨已火葬 張白帆今日為她開吊〉，《中央日報》，民國 39 年 1 月 15 日，第 4 版。該報導同時刊登出兩人熱戀時合影。

<sup>7</sup> 〈殉情女灰置法藏寺 致祭靈堂雖無弔唁悼聯 但有更多的眼淚與嘆息〉，《中央日報》，民國 39 年 1 月 16 日，第 4 版。

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隔膜。<sup>8</sup> 也有從單純的兩性關係進行討論，認為：「她與他的內幕情形我雖不知，即憑遺書看來，張先生不能否認自己沒有罪過，從前一切的愛如果是真實的，而單為了她父母稍有歧見即拋棄了她，張先生實在太對不起她，辜負了她。」<sup>9</sup>

此社會事件不止引起一般市民的關心，連時任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也寄予關心，同情陳素卿遭遇，領銜與臺大文學院長沈剛伯、臺灣出身的心理系系主任蘇薌雨、中文系教授毛子水聯名發起募款補葬陳素卿並投書《中央日報》：

編輯先生：連日

大報載陳素卿女士死事，及其遺書，同人相逢皆談此事，不勝傷懷，何感人之深也。陳女士之死，或論其值得一死否，或歸咎於社會制度，此皆淺乎言之，而不達性命之道者也。陳女士之才，見乎其文，粗學二年，有此天成之作，此豈為遺名於後人乎？而精靈之誠，遂成此文，老師不逮。老師非不能文，無此情之真也。……世之以身殉道者，或自外礪，人曰可貴猶若同懷者之情也，陳女士則殉赤子之靈心耳，猶若有勝焉。漢末焦仲卿夫妻之事，事本尋常，舊來婚姻多有，然二千年流傳不已。今陳女士之遭逢，極世間之矛盾，則舍命不渝矣。昔冤禽銜石以填海，遂成巨洲，望帝思歸而羽化，乃託杜鵑，詩人詠之，不達其義；好古者錄之，未著其解。今見此事，昧昧思之，則遠古神話，頓識其義矣。我等棲遲島上，以書代耕，愧無巨筆以傳奇，深憾無力於補天，頗願同此心者集其薄貲，葬陳女士於山水清幽之所，塵囂不染之間，題其碣曰：「同情者共葬陳女士於此」，庶幾陵谷變遷，文字隨劫而遺盡，宇宙不滅，精靈緣意而不亡。

大報如以為然，敬祈登出此信，以來應者，感幸何似。

敬頌 撰祺

傅斯年 沈剛伯 蘇薌雨 毛子水

一月十八日<sup>10</sup>

<sup>8</sup> 〈人性的控訴：哀陳素卿之死〉（作者沒有署名），《新生報》（新生副刊），民國39年1月18日，第9版。

<sup>9</sup> 王曰之，〈看陳素卿遺書感想〉，《中央日報》，民國39年1月16日，第4版。

<sup>10</sup> 〈傅斯年等昨發起 補葬陳素卿女士 願同此心者集其薄貲〉，《中央日報》，民國39年1月19日，第4版。此文收於傅斯年，《傅斯年選集》（臺北：文星書店，1967），第九冊，頁1595-1596。

此投書立即得到其他學者的呼應，著名大陸來臺戲劇學家齊如山在此投書刊出之後立即表明贊成，主張不但應該改葬陳素卿，而且進一步將其事跡編入教科書，至少也要編入民眾讀物。<sup>11</sup> 眾所皆知，傅斯年是五四健將，1918年，新文化運動時期與羅家倫、毛子水等人組新潮社，仿效《新青年》，創辦《新潮》雜誌，宣傳科學與民主思想，提倡新文化和白話文，並參與領導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學生運動。195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簡稱「國府」）剛播遷來臺，剛由日本殖民體制解放的臺灣社會，在長期渴望脫殖民地的期待下，對「祖國」懷抱著極大的幻想，然而，前來接收臺灣，代表「祖國」榮光的軍隊及統治階層與已被日本化的臺灣社會卻存在著根本的鴻溝，除了「族群意識」之外，更深刻的是兩者間無法跨越的語言問題。因此，經過光復最初期的興奮之後，逐漸冷靜下來的臺灣民眾與新來的祖國「同胞」之間緊張感日漸高升，在臺灣本地人士與大陸來臺人士之間屢有齟齬的情況下，加上國語運動的推行也正方興未艾，陳素卿的遺書內容所展現的為自由戀愛而殉情、努力學習「國語」、閱讀中國新文學作品、流暢的白話文遺書及其傳達的「外省人」正面形象，與以死呼籲不要再仇恨外省人的作法，很容易得到學者們的共鳴，可以說，此事件儼然成為一種具有正面意涵，馴化臺灣民眾的社會教化之最佳教材，特別是本省籍女子之殉情，除了浪漫色彩之外，也滿足了這群暫時來臺的統治階層的自大心理，此外，學者們也樂於透過此事件解消日漸對立的省籍情結。此轟動臺灣一時的殉情社會事件，不僅在當時成為話題，日後也成了中國著名現代文學作家陶晶孫日文作品〈淡水河心中〉的題材。

### 三、臺灣時代的陶晶孫（1946-1950）

本文所討論的陶晶孫，這位游移中國、日本、臺灣的「跨界者」在臺灣文學史的書寫中可說是被完全遺忘的一位，然而臺灣卻成為他文學作品中的一頁被記錄著。陶晶孫，本名陶熾，又名熾孫，筆名晶孫、陶藏、烹齋、冷孤原等，1897年生於江蘇無錫，祖父曾任官太平天國，父廷枋，曾中秀才。幼時在家鄉廷弼小

<sup>11</sup> 齊如山，〈兩個理由：關於改葬陳素卿女士〉，《中央日報》（中央副刊），民國39年1月24日，第6版。

學就讀，1906 年和姊隨父移居日本東京，先後於東京的錦華小學、東京府立第一中學、第一高等學校就讀。1919 年入學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低郭沫若一級，入學九州帝大後，對文藝熱愛日深。1921 年春和郭沫若、郁達夫、何畏等人共創同仁誌《グリーン》（綠），陶晶孫在第二期發表其日文短篇小說處女作「木犀」，郭沫若大為折服，勸陶晶孫譯為中文發表，郭沫若在讀了中文版後，讚嘆：「每個國家的國語有其獨特的美，此篇小說的中文版遠遠不及日文原作特有的深層韻味。」認為陶晶孫的日文表達優於中文。同年 7 月，與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成仿吾等人共同發起成立「創造社」，提倡「為藝術的藝術」。1923 年 4 月，九州帝大畢業後，轉入東北帝國大學理學部物理學教室就讀，同時也在醫學部生理學教室從事電氣生理學實驗，課餘並組織交響樂團，擔任指揮。翌年和郭沫若日籍夫人佐藤をとみの胞妹佐藤操結婚，並屢屢在《創造季刊》、《洪水》等中國的文學刊物發表短篇小說。1926 年，陶晶孫取得醫師證書，移居東京，任東京帝大醫學部助手，又兼東京帝大附屬泉橋慈善醫院醫師。1927 年，由上海創造社出版代表作短篇小說集《音樂會小曲》，日後被稱為是中國最初受到日本新感覺派文學影響的作品。

1929 年，陶晶孫告別寓居二十三年的日本返國，從九歲的小留學生，一路經東京府立第一中學、第一高等學校、九州帝大、東北帝大的薰陶已成為中國新一代的知識分子。戰前的高等學校和帝大是日本培養統治階層的高等學府，陶晶孫在此高等學府接受了當時日本的西歐式高度教養主義教育及專業訓練，培養了其音樂、文藝等藝術素養使其兼具了科學家與文學家的身分。<sup>12</sup> 陶晶孫的返國，意味著他必須面臨再一次的國境與語境之跨界。返國後，陶晶孫任上海東南醫學院教授，同時繼續創作活動，並且日益關心左翼文藝和戲劇運動，特別是對木偶戲的注目，他先後翻譯描述農民出身的日本士兵之覺醒的反戰劇作「勘太和熊治」、德劇作家 Hans Sachs 的劇作「傻子的治療」、木偶戲的解說等在雜誌發表，於 1930 年集結成書《傻子的治療》由上海現代書局出版。同年 3 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一般簡稱「左聯」）成立，陶晶孫為盟員之一，8 月，返回故里無錫開設厚生醫院。1932 年，厚生醫院停辦，回任上海東南醫學院公共衛生學教授，並兼任日人

<sup>12</sup> 戰前日本舊制高等學校的「大正教養主義」教育與陶晶孫人格、學養的形成，詳見嚴安生，《陶晶孫その数奇な生涯：もう一つの中国人留学精神史》（東京：岩波書店，2009），第一章，頁 3-73。

創辦之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從事寄生蟲學等調查研究。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東南醫學院遷移重慶，8月，上海發生「八一三事變」，夫人攜三子暫離滬赴日，陶晶孫體弱多病，獨居上海，任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衛生研究室主任。1941年，夫人攜子返滬，1944年5月，散文集《牛骨集》由上海太平書局出版；日文《陶晶孫日本文集》由華中鐵道出版。11月，以上海市代表身分，出席在南京舉行的第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陶晶孫與東南醫學院院長郭琦元等人奉派為接收專員，前往南京接收日軍陸軍醫院。1946年赴臺，擔任臺灣大學醫學院熱帶醫學研究所教授兼衛生學研究室教授，其時長男與次男皆在日本求學，故僅帶著三男易王和夫人赴任。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府撤退到臺灣，陶晶孫的連襟郭沫若擔任了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50年代初期，韓戰爆發前夕，中國隨時準備「解放」臺灣，如驚弓之鳥的國府積極追捕彈壓所謂的「共黨分子」，過去身為「左聯」一分子的陶晶孫處境的艱難可以想像。1950年年初，陶晶孫從擔任國民黨秘密警察的遠房姪兒張延生處得知三男因參與學運名列黑名單，遂決意逃離臺灣。同年4月，以赴日參加學術會議之名，一家三口從臺北抵日本，居住東京郊外的千葉縣市川市，陶晶孫再度重返過少年時代與青年時代的日本。其後約在1951年初獲得永久居留權，4月，受東京大學文學部倉石武四郎教授之邀，擔任文學部兼任講師，講授中國文學史，並以寄生蟲學的研究論文取得千葉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此時也開始應《文藝》、《展望》、《歷程》等文藝雜誌之邀稿，恢復日文創作，漸受日本文壇注目，除了與舊識著名作家佐藤春夫、詩人草野心平、評論家河上徹太郎、文化人內山完造相往來外，也與著名詩誌《歷程》同仁時有交遊。

1952年2月，因肝癌於千葉縣市川市國立國府台病院逝世，享年55歲。同年10月，日本友人整理其晚年在日本發表的文章，題名《日本への遺書》，由東京創元社出版。<sup>13</sup>

<sup>13</sup> 陶晶孫的生平參考以下諸文撰成。鄭仁佳，〈陶晶孫(1897-1952)〉，《傳記文學》70:5(1997年5月)，頁144-148；伊藤虎丸，〈解題 戰後五十年と《日本への遺書》〉，收於陶晶孫，《日本への遺書》(東京：東方書店，1995)，頁209-239。陶易王，〈父親在臺灣〉、陶坊資，〈陶晶孫年譜〉，收於張小紅編，《陶晶孫百歲誕辰紀念集》(上海：百家出版社，1998)，頁16-18、頁223-231。

關於陶晶孫赴臺的原因，迄今皆沿用其三男的說法：陶晶孫參加了接收臺灣的舊臺北帝國大學的工作，推薦他承擔這一工作的是當時任國府衛生部長的羅宗洛，陶晶孫被聘為醫學院教授兼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sup>14</sup> 根據筆者的調查，1945年10月，國府委派羅宗洛以教育部臺灣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兼特派員身分（該委員會的委員有梁龍元兼秘書、杜聰明、蘇步青、劉光華、陳建功、馬廷英、蔡邦華、陳芳之、陸志鴻，專門委員林忠、瞿絡琛），赴臺接收臺北帝國大學，羅宗洛於10月17日抵臺，11月15日正式接收臺北帝大，並代理臺灣大學校長（1945年10月-1946年7月）。<sup>15</sup> 此後，一直到1950年陶晶孫離臺為止，臺大的校長依次是陸志鴻（1946年8月-1948年5月）、莊長恭（1948年6月-1948年12月）、傅斯年（1949年1月-1950年12月）。關於陶晶孫赴臺的原因，其三男的說法恐怕有誤，因為當時陶晶孫並不是教育部臺灣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的一員，羅宗洛也不是國府衛生部長，而且從其遺留的〈羅宗洛回憶錄〉、〈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報告書〉、〈接收臺灣大學日記〉（1945年10月17日-1946年6月3日）<sup>16</sup> 三份書誌中從沒有出現陶晶孫的記載。

三男的回憶中提及「保存下來的國立臺灣大學的聘書上則留有陸志鴻校長的署名和公章」，<sup>17</sup> 據此可以推測陶晶孫是在1946年8月，陸志鴻到任臺大校長以後才任臺大教職，至於為何任職臺大則待進一步的考證。此外，其三男指稱其「被聘為醫學院教授兼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一事也是疑點很多。1946年的「熟〔按：熟之筆誤〕帶醫學研究所」職員錄上寫著「所長代理杜聰明」，<sup>18</sup> 職員錄上並沒有陶晶孫。1947年1月的「國立臺灣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教職員錄」上寫著「教授兼所長洪式閏 浙江 到校 35.8」，此份職員錄上已出現陶晶孫的名字，職員錄上寫著「陶熾 上海施高塔路施高塔里 2 號」，沒有註明籍貫和到校時期。<sup>19</sup> 同

<sup>14</sup> 陶易王，〈父親在臺灣〉，頁16。

<sup>15</sup> 李東華、楊宗霖編校，〈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頁114-118。杜聰明，〈回憶錄之臺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臺北：龍文出版社，2001），下冊，頁179-180。

<sup>16</sup> 均收於李東華、楊宗霖編校，〈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集〉一書。

<sup>17</sup> 陶易王，〈父親在臺灣〉，頁168。

<sup>18</sup>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各單位及臺北市各公共機關職員錄〉（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頁217。

<sup>19</sup> 國立臺灣大學編，〈國立臺灣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教職員錄〉，收於《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47），無頁碼。

年 8 月的臺大教職員名單上，醫學院熱帶醫學研究所也有陶晶孫，寫其本名陶熾，所長是洪式閩，此外陶晶孫還是醫學院衛生學研究室教授。<sup>20</sup> 1947 年和陶晶孫同時在熱帶醫學研究所任職的副教授鄭翼宗也曾回憶傅斯年到任後，洪式閩所長即離任返回大陸，從 1949 年新年開始，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由邱賢添擔任。<sup>21</sup> 因此陶晶孫擔任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的說法值得商榷。

陶晶孫於臺灣時代的活動，目前能夠確定的部分列表於下：

時間	活動內容
1946.8	抵臺北，任臺灣大學醫學院衛生學研究室教授兼熱帶醫學研究所教授
1947.11.15-16	出席臺灣醫學會第四十屆總會
11.16	在總會單獨報告〈「Metorchis 屬兩種吸蟲研究補遺」〉（熱帶醫學研究所，陶熾），共同報告「鄉村社會衛生研究（一）鄉村飲用水調查（臺北附近）」（熱帶醫學研究所，劉萬福、王長流、陳拱北、陶熾）
1949.10.28	中英文調查報告提要〈臺灣鄉村之社會衛生學的研究（三）臺北附近鄉村常食調查〉（國立臺灣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衛生學科，陶熾孫），發表於《臺灣醫學會雜誌》第 48 卷，第 9-10 號。
12.18	出席臺灣大學 38 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
1950.02.18	中英文共同調查報告提要〈臺灣鄉村之衛生學的研究（一）臺北近郊鄉村飲用水水質調查〉（國立臺灣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衛生學科，陶熾孫、陳拱北、王長流、劉萬福），〈（三）臺北近郊鄉村常食調查〉（陶熾孫、陳淑瓊、葉根在），發表於《臺灣醫學會雜誌》第 49 卷，第 2 號。
1950.04	與夫人、三男從臺北抵日本。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立臺灣大學 37、38、39 學年度校務會議記錄。《臺灣醫學會雜誌》47: 1 (1948 年 2 月 28 日)，頁 4、26-27；《臺灣醫學會雜誌》48: 9-10 (1949 年 10 月 28 日)，頁 107、202-203；《臺灣醫學會雜誌》49: 2 (1950 年 2 月 18 日)，頁 22、24、78-81、83 作成。

熱愛文學創作的陶晶孫，臺灣時代都專心致力於臺灣公共衛生學方面的研究，沒有留下任何文學活動的軌跡，同時期和他在臺大共事的大陸來臺著名學者、作家有文學院長錢歌川、中文系教授許壽裳、魏建功、臺靜農、共同科教授黎烈文、李霽野、副教授雷石榆，<sup>22</sup> 其中雷石榆還曾參與「左聯」東京支部的活動，他們都未曾留下任何與陶晶孫的交遊記錄。此外，陶晶孫和臺灣本地人士的互動也非常有限，上述和他一起在熱帶醫學研究所共事過的臺灣本地人士杜聰明和鄭翼宗的回憶錄中，也未留下任何與他相關的隻字片語，反而是同時期在醫學

<sup>20</sup> 臺大同學會編，《臺大同學會會員名簿》（臺北：臺大同學會，1947），頁 36、34。

<sup>21</sup> 鄭翼宗，《歷劫歸來話半生：一個臺灣人教授的自傳》（臺北：前衛出版社，1992），頁 226-227。

<sup>22</sup> 臺大同學會編，《臺大同學會會員名簿》，頁 27、36。

院隸屬解剖學研究室的著名體質人類學家金關丈夫，留下了對他的個人回憶：

昭和二十一年在臺灣第一次和陶熾博士見面，……直到我離開臺灣為止，共交往了三年多。當時陶博士是臺大醫學部的衛生學教授，沒有自己的講座，並兼附屬熱帶醫學研究所研究人員。當時大學的研究條件不差，但是薪水很低，來臺的教授們和從大陸撤退來臺的人一樣，理應生活很辛苦。但是很多來臺教授過沒多久從外表上即可看出其生活非常充裕，陶熾博士是少數生活一直很清貧的其中一位。有一天，醫學部前面的大馬路上，有一位個子很高的男子披著一件黑色綿袈裟，稍微彎著身子，飄然走過。走近一看，原來是陶熾先生。我看到了他的清貧身影。<sup>23</sup>（筆者譯）

而臺灣本地人士唯一有關他的記述是在他逝世將近半個世紀之後，臺灣大學教授柯慶明的個人回憶：

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大醫部的先父柯源卿先生，在光復後攜眷（我當時未滿週歲）返臺。在臺北偶遇，早期為創造社成員，作品入選《新文學大系》的陶晶孫先生，陶先生與郭沫若是連襟，因為自身是九州帝大醫學部畢業，後來又在東北帝大研習，受業同屬日本帝大系統，對先父不免惺惺相惜，……。

小時候父母以日語稱呼的「陶先生」，在家裡似乎是一個莊嚴神聖的存在。跟我有關的是「陶先生」送了一雙灰褐色造型摩登典雅的小孩皮鞋給我，在戰後那百物匱乏的年代，顯然是彌足珍貴的「寶貝」。<sup>24</sup>

臺灣時代的陶晶孫為何在文壇上噤聲呢？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六百萬人口中，日語的使用率保守估計高達百分之七十，臺灣基本上仍屬於日本語文化圈，<sup>25</sup> 因此對他而言，臺灣雖然陌生，但不會是隔絕的「國境」與「語境」。從其對〈淡水河心中〉一文的主角智芙的介紹中，可以得知這位和作者陶晶孫有

<sup>23</sup> 金關丈夫，〈陶熾博士のことども〉，《福岡医学雑誌》12（1952年12月），後收錄於金關丈夫，《南方文化誌》（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77）。本文引自《南方文化誌》，頁34。

<sup>24</sup> 柯慶明，〈五四：印象與體驗〉，《文訊》283（2009年5月），頁85。

<sup>25</sup>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38。

著相同背景年輕學者，因具有日文能力所以能夠跨越語言的藩籬進入臺灣社會，因此具有相同背景的陶晶孫應該能夠容易的進入臺灣。筆者僅能從當時的氛圍進行推測，當時正是國府剛收復臺灣之際，整體而言，社會氣氛緊張加上文化出版方面限制頗多，除了禁止雜誌、報紙使用日語外，能發表中文作品的園地也相當有限。此外，作為文學者的陶晶孫，在戰爭期間以陶晶孫之名曾在上海參加日偽組織「中日文化協會」並出席第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活躍於上海。特別戰後初期對於「漢奸」相當敏感，曾為「偽政府」工作或者加入「偽組織」的人士很容易被認為是漢奸或者協力者而遭到不測之禍，這些不甚光彩的前歷可能是他到臺灣以後選擇了作為科學家的「陶熾」，而不是作為文學家的「陶晶孫」來活躍的主因。然而，這位在臺灣幾近噤聲的文學者，日後在抵日本之後卻又恢復陶晶孫之名用文字記錄了臺灣，在其文學中留下了臺灣的「跨界」印記。

#### 四、致命的吸引力：當臺灣女子邂逅大陸男子

1945年8月日本戰敗，著名作家龍瑛宗寫下「八月十五日，是世界人類史上，最可紀念的一劃期的一日，殘虐和破壞的鐵鎖，既告解斷，自由與平和，瀰漫世界，君臨到全民族的頭上去。在我臺灣亦受歷史的餘波，由被壓迫及暗黑中而解放」，<sup>26</sup> 這種解放不只意味著全體臺灣人從異民族的壓迫中解放，同時也代表著新社會中的臺灣女性之解放，隨著就職機會的增加臺灣女性的社交圈也隨之擴大，在時代的氛圍下，每個人都有了追求自由與解放的可能，這種久違的自由風氣也成為戰後初期的臺灣女子社交活動的轉換契機。

1945年10月國府正式開始接收臺灣，戰後來臺的大陸男性最初多半是公務員或技術員，其中有已婚者也有未婚者。透過各種機會，臺灣女性得以認識大陸男性，進而相戀、結婚。當時記者將此現象戲稱為：「隨著臺灣光復，女人們的桃花運處處展開。」<sup>27</sup> 但是，這些處處開的桃花中也潛藏著爛桃花的可能性。吳

<sup>26</sup> 龍瑛宗，〈最近文學界一瞥：三三、三四年之事情〉，《東寧新報》（旬刊），1946年1月21日，後收於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中文卷）》（臺北：南天書局，2006），第六冊，頁258-259。本文引自《龍瑛宗全集（中文卷）》，頁258。

<sup>27</sup> 游鑑明，〈當外省人遇見臺灣女性：戰後臺灣報刊中的女性論述（1945-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7（2005年3月），頁209。

濁流就親眼目睹了此怪現象：

這些接收人員不但向日產，甚至向女性也進軍了。從菊元的姑娘起，歌手濱田小姐，我知道的作家室的女孩子也被接收了。其他不限於日本人，就是本省相當有地位的姑娘，有不少落入「欺騙的結婚」的陷阱。他們威風堂堂地立個媒妁人，正式結婚，但是底牌一揭開，大部分都是當姨太太。<sup>28</sup>

當臺灣女性初次邂逅大陸男性後，諸如此類的欺騙、玩弄事件在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層出不窮，這種現象的發生除了本省女性受到外省青年所表現出來的翩翩風度吸引之外，另一存在於當時臺灣社會的「戰爭姑娘」問題也必須加以注意。由於「中日戰爭」、「大東亞戰爭」等戰事不斷的緣故，許多的臺灣女性在戰爭時期被動員加入「勤勞挺身隊」、「桔梗俱樂部」、「大日本婦人會」等皇民奉公活動團體，這些女性因為戰事的長期化因而耽誤婚期，其中也不乏因未婚夫或男友成為「志願兵」或被強制徵召入伍前往南洋而死於南方的「未亡人」，這群婦女在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被視為麻煩與包袱，雖然有工作但仍飽受不公平的歧視與嘲笑，因此對這群女性而言，婚姻是她們再度正常化的最佳途徑。吳濁流在 1948 年出版的日文小說《ポツタム科長》（波茨坦科長）中對於這類婦女的社會觀感有此描述：

戰爭姑娘真麻煩，像賣不掉的蘿蔔，怕爛掉，所以最近拼命的向阿三阿四推銷強賣起來了。……那不是我們青年的錯，而是因為她們太過於便宜，聽說最近某銀行或某公司記不大清楚了，那裏就有很多的戰爭姑娘滯留着，年齡都二十七八了，都是落花有意之輩。<sup>29</sup>

這群錯過了正常婚配年齡的戰爭姑娘，其中也有不少是在日治時期受過高等女學校教育的菁英女子，在戰後初期的解放氛圍中，一方面因青春年華不再而焦急，另一方面對於理想對象的要求也高於一般女性，當這類的臺灣女性在職場中遇見大陸來的青年，往往投射了自己對理想對象的幻想，容易陷入愛河之中，然而因男女交往而釀成的悲劇也常見於現實之中。

<sup>28</sup> 吳濁流，《無花果》（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頁 188。

<sup>29</sup> 吳濁流，《ポツタム科長》（臺北：學友書局，1948），後於 1977 年譯成中文〈波茨坦科長〉，收於吳濁流著、張良澤譯，《波茨坦科長》（臺北：遠行出版社，1977），頁 1-71。本文引自中文版，頁 32。

1946年，一位彰化臺灣女性投書《民報》專欄「自由談論」，致函「外省來的領導者們」，氣憤的指出受過「日本封建主義教育的臺灣女性，就如同剛從籠中釋放出的鳥涉世不深」，質問「外省來的領導者們」，為何「不想誠懇的啟發女性，反要利用女性的弱點？」<sup>30</sup>就在這一年，陶晶孫抵達臺灣。

究竟為何大陸男子對臺灣女子具有如此莫大的吸引力呢？吳濁流的〈波茨坦科長〉對此現象有很深刻的描繪：

在這個時候，突然在喫茶店遇見那個男人來訪。她自然不會知道他就是由大陸逃過來的范漢智。他現在已改名，把過去隱藏起來，以范新生的名字居然官拜某某局會計科長，這是誰也不會想到的事。

玉蘭很高興地歡迎他，因對祖國憧憬的情緒無意識中搖撼著她，由心中發生好感，這就是她心中深處發生的無聲息的思慕的情愫凝結的一個形態，是一種使她不能了解的……而且茫然的一種情愫。

「前幾天很失禮，剛到此地人地生疏，星期天沒有地方去，所以今天很冒昧來拜訪妳。」

用流暢的國語，范新生說明來訪的動機，那種老於社交的風度，梳得光亮的頭髮，畢挺的西裝，今天更顯得瀟灑出羣，而那慎重謙讓的談吐，尤其是對女性親切的口吻，粗線條的臺灣青年那裏比得上，所以使她有可親可靠的感覺。不但如此，豐富的話題對於她都是珍異的，尤其是說起新時代上海女性活躍的狀況，特別使她羨慕。……

范漢智辭出玉蘭的家後心裏想：臺灣女性沒有技巧，率直得可愛，可能對情感很脆弱，可是純真，純真所以單純，單純所以能隨心所欲。<sup>31</sup>

從上述吳濁流的描述，透過主角玉蘭的視角所呈現的「范新生」這位理想的祖國青年像，不僅展現了臺灣青年所欠缺的紳士作為，親切的態度以及清晰流利的「國語」，其言談舉止中所散發的祖國青年魅力都讓初次接觸的臺灣女性怦然心動，從中我們可以理解大陸男子對臺灣女子具有致命吸引力的原因。

<sup>30</sup> 游鑑明，〈當外省人遇見臺灣女性：戰後臺灣報刊中的女性論述（1945-1949）〉，頁209。

<sup>31</sup> 吳濁流著、張良澤譯，〈波茨坦科長〉，頁12-13。

臺灣光復後，臺灣女性和臺灣男性一樣，對首度正面接觸的父祖之國——中國充滿好奇與好感，她們認為中國男子的舉止溫文有禮，能講純正中國語的中國男人都是來自中國的社會菁英，值得敬愛信賴的。我們可以再證之陳素卿留給張白帆的遺書中也再三強調「你是一個純潔的青年，我們兩年的日子，來往那樣親密，你從來也沒有對我要求要做的那樣事情，我也從來沒有看出你有要求的意思，……我常常不相信你們外省人會這樣老實」，「你是那樣的誠實，那樣的用功，對人是那樣的和氣，這一切都是我從來沒有看見一個人是這樣的，……你告訴我許多我從來沒有知道的事情，使我覺得人生是怎樣有意義，使我覺得你是一個偉大的人，很值得我來敬愛你。」<sup>32</sup> 張白帆對陳素卿就是這樣的具有致命吸引力，因此最後導致陳素卿臨死前對張白帆留言「你實在太偉大了，你把我教育，又離開了，使我覺得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你這樣理想的人，所以我只有自殺了。」<sup>33</sup> 除了如陳素卿這類的菁英女性與外省男子的戀愛外，出身平凡的臺灣女性在遭遇外省青年時也必須面對社會位階迥異的現實而不得不屈服於現狀，呂赫若在戰後撰寫的小說〈冬夜〉中便明白的體現了這點，主角彩鳳在戰時經歷了一段僅維持了五個月的婚姻，丈夫便因戰爭而被徵召為「志願兵」，最後戰死於菲律賓，因為丈夫的死亡而被夫家徹底拋棄的彩鳳，只好返回娘家，為了維持生計而在酒館陪酒，就在酒館中邂逅了從中國來臺的外省男子郭欽明：

碰到了郭欽明就是在那個酒館裏的。……只是聽了同事說他是個××公司的大財子，浙江人，年紀差不多二十六七歲。他來館的時候，都穿著一套很漂亮的西裝，帶着一個笑臉，很愛嬌地講著一口似乎來臺以後才學習的本地話，使女招待們圍繞著他笑嘻嘻地呈出一場熱鬧。<sup>34</sup>

這位外表亮麗且多金的男子一面對彩鳳獻起殷勤，一面伴隨著這種殷勤而來的強硬的佔有慾也逼迫著彩鳳不得不委身，他說道：

<sup>32</sup> 〈家庭阻擾難締鴛盟 悲憤自殺永保純潔 陳素卿致張白帆絕命書〉，《中央日報》，民國 39 年 1 月 14 日，第 2 版。

<sup>33</sup> 〈家庭阻擾難締鴛盟 悲憤自殺永保純潔 陳素卿致張白帆絕命書〉，《中央日報》，民國 39 年 1 月 14 日，第 2 版。

<sup>34</sup> 呂赫若，〈冬夜〉，《臺灣文化》2: 2 (1947 年 2 月 5 日)，頁 26。

「假使你不肯接受我的愛，那麼，我們現在一起在這裏打死好不好。」彩鳳睜開眼睛看了那枝手槍，便耳管裏轟轟地響起來，又有些黑星在眼前跳來跳去。她想起了自己的娘家的情形，就無聲低首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sup>35</sup>

戰後初期的臺灣，在這種軟硬兼施的態度之下與外省男子婚配的臺灣女性也不在少數，從中呈顯出此時期的臺灣本省人與外省人在社會位階上的不平等，以及大陸來臺的男子在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所佔有的優勢位置。

然而臺灣女性與大陸男性的通婚，隨著層出不窮的大陸男性之欺騙、玩弄事件，使得願嫁大陸郎的臺灣女性逐年遞減，這種現象一開始無關省籍問題，只純粹是個人因素問題，但是二二八事件以後，這種個人因素問題卻被上綱到與省籍問題產生連結，<sup>36</sup> 陳素卿的殉情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50 年是二二八事件過後的第三年，臺灣本地人士對這場悲劇記憶猶新，對「外省人」的憧憬也轉換為複雜的憎畏感，二二八事件中引爆的省籍情結，成為張白帆與陳素卿的戀愛中無法跨越的鴻溝，可以說，戰後初期臺灣社會的緊繃省籍情結早就昭告了張白帆與陳素卿的悲劇。

陶晶孫是在 1946 年抵臺，1947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因出差上海，短暫離臺，返臺之後對於社會的奇異氛圍應有深刻的感受。1950 年 1 月發生的陳素卿殉情事件，讓存在的省籍問題浮上檯面，不只轟動全臺，甚至震驚到當時臺大校長傅斯年，此事在臺灣社會引起的迴盪，即使在陶晶孫東渡日本之後，肯定也留下深刻印象。陶晶孫以此社會事件為藍本，混和了他將近四年的臺灣生活所感，寫下此篇既紀實又虛構的日文小說〈淡水河心中〉。

## 五、戰後臺灣社會像書寫：〈淡水河心中〉

陶晶孫所遺留的臺灣書寫〈淡水河心中〉，不僅記錄了作者的臺灣觀察，同時也藉由這篇小說揭露當時赴臺文人學者的心境，可以說，這篇跨界者陶晶孫的

---

<sup>35</sup> 呂赫若，〈冬夜〉，頁 28。

<sup>36</sup> 游鑑明，〈當外省人遇見臺灣女性：戰後臺灣報刊中的女性論述（1945-1949）〉，頁 209-210。

跨界觀察中濃縮了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氛圍，同時也展現了各個層面的人物像，透過虛構的小說文類表述了真實的社會現實。〈淡水河心中〉發表於 1951 年 7 月號的《展望》，佐藤春夫讀了之後，大為讚賞，認為「應該尊重其新鮮的文體和兼具自然科學家與文學家之獨特構想，期待今後陸續有新作發表。」<sup>37</sup> 就小說文體而言，陶晶孫的〈淡水河心中〉呈現出與同時期的日文小說不同的書寫模式，以曾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作為書寫的場域進一步重新爬梳一殉情事件，正如同佐藤春夫的評論一般，陶晶孫的小說中不僅有文學者陶晶孫的細膩的小說敘事，同時從推理情節的鋪陳也展現了科學家陶熾追根究柢的心理。對陶晶孫這位精通日文的小說家而言，他以〈淡水河心中〉為名展開的小說書寫，其中「心中」一詞的使用隱含了作者深刻的含義，日文的「心中」即為中文的「殉情」，也就是相愛的男女為了見證其真愛而一起尋死之意，然而小說雖以「心中」開頭，全篇中卻是透過戰後初期臺灣女性與外省男性的交往而逐一暴露戰後社會的省籍議題，終究此件被浪漫化的「心中」事件在小說中被重新改寫並以刑事事件結尾，從全篇小說的敘事中可以看出陶晶孫在此使用「心中」之詞所富含的深刻反諷意味。小說中的敘述者：智芙，為外省籍但具有日文背景的臺灣「過客」，陶晶孫透過這位心理學研究室助教的觀看者視野，將陳素卿的殉情事件小說化，並以此展開小說的敘事，通過智芙與心理學教授兩人的對話勾勒此一事件，呈現出現實與虛構交織的文體增添此篇小說的趣味性，同時也透過智芙的觀看者視角書寫臺灣，並藉此事件反思當時客居臺灣外省人的心理，〈淡水河心中〉雖然是一則社會事件的改編之作，然而陶晶孫透過此一事件所書寫的戰後臺灣圖像，卻清楚的指出當時存在於社會上的矛盾，特別是外省與本省之間的隔閡，以及深埋於臺灣的日本記憶。

小說開頭便以臺灣的山林、河流、建築交織出整體樣貌，主角智芙記憶了從上海飛抵臺北的臺灣印象「左邊的大屯山，右邊的觀音山為臺灣的入口之地標，遠遠的淡水河像是一條飛機跑道是臺灣的玄關，地面上散置著荷蘭人建造的童話故事般的城堡，上面飄揚著英國的國旗，在這之下的地面遺留著日本炮兵陣地。

<sup>37</sup> 佐藤春夫，〈陶晶孫先生が遺著のために〉，收於陶晶孫，《日本への遺書》（東京：創元社，1952），頁 3。

(筆者譯)<sup>38</sup> 從這段地理圖記的敘述中可以窺見主角智芙的觀看視域，對這位上海來臺的青年而言，臺灣雖是重歸「祖國」之地，然而卻是充滿了異國情調的「異域」，平坦的台地、終年煙霧迷濛就像蠻荒地區一般的高聳山脈、椰子樹、淡水河的傳說，一一點綴了臺灣的異國氛圍，對於智芙這位具有日本經驗的外省青年而言，臺灣的混雜性吸引了這位青年的注目。陶晶孫透過這些臺灣印象記的展示記錄了臺灣屢遭奴役的象徵，從而也暗示了「復歸祖國」的臺灣社會中所隱含的複雜殖民記憶以及與新來的統治者之間必定存在的隔閡。小說中也提及了大陸與臺灣認知思考上的迥異：

……在日治時代，他們不喜歡被稱為「臺灣人」，反而喜歡「本島人」的稱呼，所以現在也不想被稱為「臺灣人」。其實，「本島人」的說法才是指當地人吧！就這點來看，中國內地人說：「我是山東人，你是臺灣人」的心理就無法被理解了。<sup>39</sup> (筆者譯)

此處提及的思考差異也點出了戰後初期臺灣民眾與大陸來臺人士屢起爭執的核心，由於彼此歷經了五十年的斷裂，加上日本在臺所實施的皇民化運動對臺灣人的影響甚深，整體而言，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語言與習慣都還延續日治時期的生活，其思維邏輯可說尚未脫殖民化，後又有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激化了原本溝通不良的省籍問題。小說中心理學教授曾語重心長的歎道：「一個民族會害怕另一個民族。」一語道出戰後初期臺灣與大陸雖然在政治上得以統一，然而對這些來臺的外省統治者而言，臺灣人終究是「異族」的存在。〈淡水河心中〉的青年學士智芙可視為作者陶晶孫的化身，因為具有日語能力與日本經驗使得他得以深入臺灣社會，這位貧窮的外省青年最常活動的地方除了命案的發生地：十三號水門之外，還有一般臺灣民眾活動的地域「圓公園」，<sup>40</sup> 他雖不懂臺灣話，但是由於臺灣民眾都夾雜著日語對話，因此他也能理解對話的內容，「圓公園」可視

<sup>38</sup> 陶晶孫，〈淡水河心中〉，頁95。

<sup>39</sup> 陶晶孫，〈淡水河心中〉，頁95-96。

<sup>40</sup> 1908年由日本規劃為公園，稱為「圓公園」〔按：圓公園即為現今的「建成圓環」，位於臺北重慶北路與南京路的交叉口〕。1943年美軍轟炸臺灣之際，日本人將圓環挖成大蓄水池以作消防設施，光復後，圓環被填平，由攤販進駐成為繁華的商圈，於2006年之際被拆除改建，現已不復當時的繁華景象。

為智芙進入臺灣社會的玄關處，就在市井熙攘的街談巷語中，這位跨界的「考察者」拼湊了臺灣圖像。陶晶孫筆下以這位臺灣見證者智芙作為一位「中介」的角色，企圖讓此社會事件以多元的角度被呈現，陶晶孫透過這位跨越了語言障礙的跨界者塑造出一種有別於新聞報導等官方公共輿論的世界，亦即「圓公園」中流傳的關於此事件的臺灣民間輿論中反轉了官方報導的真相，形成了一種臺灣民眾間流傳的「真實」，透過「傳說」、「流言」，〈淡水河心中〉這篇虛構的小說中同時承載了兩種「真相」，同時也有效的解構了官方的一言堂。

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無論是語言或思維仍承襲日治時期的模式，特別是出身良好且受過高等教育的臺灣女性，其所受到的日本式馴化更為完整，除了作為一位良好女性該有的教化之外，這些女性同時也注重生活趣味的培養。在過往的臺灣社會中，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千金小姐們通常在家族的安排下會有一段門當戶對的婚姻，或嫁給醫生成為「先生娘」，或嫁給商行的二代成為「阿娘仔」（少奶奶），總之是透過家族之間的「緣談」（說媒）而成的姻緣。然而，隨著戰爭結束，復歸中國的臺灣社會也起了變化，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臺灣女性開始參與社會，與隨著國府來臺的外省男子有了接觸契機，與外省男子之間的戀愛事件也時有所聞。這群新來的外省統治者取代了日本人的地位，在臺灣佔有優勢的社會位階，光鮮的外表、彬彬的談吐、標準的國語（對臺灣人而言）以及對女性特有的殷勤都能輕易的擄獲臺灣女性，國語的使用成為這群新來的統治階層的權力象徵，然而，戰後來臺的外省籍人士中，如吳濁流筆下的范漢智，後以范新生之名在臺灣成為新貴，玩弄臺灣女性之人也多不勝數。現實事件中的張白帆對陳素卿而言不僅是一位理想的伴侶，同時也是人生的導師，他象徵了陳素卿自身想像的美好未來，失去這位人生的引導者也意味著她未來的崩解，因此她選擇了死亡。此件在當時社會被浪漫化並加以傳誦的現代版「烈女傳」，在小說中，陶晶孫將此殉情事件一轉為犯罪事件，同時也明確的指出：「她（吳少貞）的愛意其實是內地人對她的吸引力。」道出了本省女性對外省男子的憧憬，實際上都是自己的幻想，與其說是愛上的這位男性，不如說是這位男性身上的特質滿足了本省女性的想像。同樣的幻想在〈波茨坦科長〉中也多有描述：

她忽然想起光復當時的心情，祖國！唉。那是較自己父母還更親的話。她想出了是那個感情凝結起來成為對丈夫的憧憬的。唉！自己到底也是……。<sup>41</sup>

小說主角玉蘭，這位憧憬祖國且沉醉於光復榮光的本省女性，一面對於終究能擺脫殖民地而回歸祖國懷抱的臺灣感到無比幸福，一面因戰爭而耽誤的青春年華以及對愛情的幻想，在遇到范漢智這位理想對象後便一一將自身的期待投射於其中，在情感的激化下，過度美化了這些來臺的外省青年，而忽略了包裹在幻想背後的現實。

〈淡水河心中〉透過揭穿陳不凡的假學士面貌戳破戰後初期部分外省來臺人士經過包裝的外在，同時諷刺了當時欲替此事件立碑作銘的外省名士，並點出其背後隱含的政治思考，在這篇以日文寫成的小說中，這群寓居臺北的外省籍的高級知識群以文言體讚譽陳素卿宛如焦仲卿夫妻，又有如杜鵑銜石填海，此種層層疊疊為烈女明志的悼文在通篇日文的文章中猶如戰後初期包裝華麗的外省男子一般，諷刺的顯現了整個殉情事件猶如層疊的語言包裝一般，是一種仿造現實的虛構表現。張白帆與陳素卿的戀愛事件，後雖以殉情案結案，然而其中潛藏的疑點以及部分在臺外省人士的心態卻在陶晶孫的小說中一一揭露。

小說透過智芙與教授的對談開啟了情節，以多重視角記錄此案件，由多層敘事中拼湊出事件的輪廓，同時當案情由殉情案一轉為刑事案之際，這位「跨界者」也犀利的記錄了各方的反應，在這一篇書寫臺灣的〈淡水河心中〉中表述了戰後初期的各層心理。首先是心理學教授的心態，臺灣女性與外省男性的戀愛事件引發了這位暫居臺灣的年輕教授之浪漫情調，特別是這位殉情案的女主角吳少貞的望族出身，以及男主角陳不凡的外省出身皆符合了其異國情調的浪漫想像，同時吳少貞留下的遺書中所使用的「臺灣女孩寫不出來的國語白話文」也滿足了這群暫居臺灣的「過客」們教化臺灣之幻想，對戰後初期來臺執教的年輕教授而言，這起事件的浪漫性點綴了其無聊的客居生活。其次是大學校長<sup>42</sup>的反應，此

<sup>41</sup> 吳濁流著、張良澤譯，〈波茨坦科長〉，頁 54。

<sup>42</sup> 《展望》版〈淡水河心中〉把校長和院長的稱謂混用，而「創元社版」全部統一為校長，今照「創元社版」。

事件見報當天，校長立刻提筆，草就一文：「世間雖多貞女，吾等邊陲之地，猶見如少貞者。見其遺書曰，少女純情，不怪郎無情，僅將其妻比之狐狸精。相戀不成則盡節，淡水河畔殉我身，云云。吾等於此承日人統治之後，而為邊民之先導之時，如何稱頌少女之純情？余提議吾等有志之士，於北投山麓，俯瞰淡水之地立碑，以誌貞少女殉節之紀念。（筆者譯）」<sup>43</sup> 這起原本單純的戀愛事件經過校長這位經學大師之文後，成為臺灣版本的烈女傳，是一種具有政治意圖的作法，試圖透過此事件安撫蠢動的臺灣社會，同時也隱含了告誡的意涵。此外，此事件也提供了一般來臺的普通外省民眾茶餘飯後的消遣，小說中寫道：

兩、三天之間，謳歌少女的折頁在街上氾濫，有的印上吳少貞的照片，用美女來說故事；有的用獵奇的手法，畫出自殺現場的寫生圖。歌本也作出來了，那是等著回大陸時，無聊的人們寫給一樣無聊的人們閱讀的解悶作品。但是，這些和臺灣人無關。<sup>44</sup>（筆者譯）

從中可以得知，戰後初期臺灣社會的輿論基本上是採取複線式的傳播，外省來臺人士依靠著中文報章取得訊息，另一方面，臺灣本地人士，除了少數有過大陸經驗的臺灣人之外，依靠的資訊來源主要是日文，此外，就是靠著像「圓公園」這類的大眾輿論場地的流傳，跟統治階層可以說是以一種既交集又平行的方式汲取社會資訊。因此當事件牽涉到兩方之際，故事便在兩方間透過不同的線索、立場被加以重構，〈淡水河心中〉透過這位可以跨越語言的青年學者，巧妙的勾勒了兩方的視野，同時也暗喻了這則愛情故事中的虛構意識。

上述從教授到大學校長乃至於一般外省民眾對於此事件的認知主要具有兩種層面，一是大眾化的異國情調的浪漫傳說，一是從教育、政治目的出發，可以說這位出身良好的臺灣女性為外省男子的殉情事件，滿足了作為新統治者的外省族群們的征服慾望。然而就在事件由自殺轉為他殺，由浪漫傳說成為犯罪案件之際，這位教授與校長不約而同的改變態度，教授說道：「唉，事情沒有鬧大就好了吧。從前生蕃會為了這種事獵取許多人頭。」校長也一改「很浪漫」之稱呼，

<sup>43</sup> 陶晶孫，〈淡水河心中〉，頁 96。

<sup>44</sup> 陶晶孫，〈淡水河心中〉，頁 97。

而大呼自己被愚弄，至於街頭的折頁、歌本、小報等都在一天內消逝無蹤，針對此事件，作為統治階層的陶晶孫在小說中也指出：

當內地人完全沒責任時，如果只有內在的恐懼，就可以讚美少女的浪漫。然而，如果要擔負起實際的責任時，就不能說出那樣的話了。<sup>45</sup>（筆者譯）

智芙從臺灣社會的玄關「圓公園」中得知了事件的真相：

少貞不是自殺的，而是他殺，屍體被人用手拉車拉到淡水河棄屍，那個車伕已經落網。日本人訓練出來的警察很厲害，陸續抓到嫌犯。「好像被鬼纏身」，其中一個人夜夜作惡夢。因為替外省人丟棄屍體，而覺得很害怕，每個晚上都夢見亡靈。<sup>46</sup>（筆者譯）

透過「圓公園」的耳語相傳，作者陶晶孫向讀者展示了事件的另一面，意即此「心中」事件的真相原來竟是一件詐欺式的情殺事件，在外省族群圈中盛傳的浪漫愛情事件原來僅是這群人的想像與傳誦，作者藉由臺灣市井之言解構了此列女傳的形塑敘事並且狠狠的諷刺了一群以道德為名的外省籍知識分子。針對此一事件的破案，民眾評論：「因為是日本人訓練出來的警察所以很厲害。」顯示了過去深刻的殖民記憶，陶晶孫巧妙的展現了臺灣重層社會的迥異，一是操著新統治者「國語」的族群，在自己的族群圈中想像著臺灣，恐懼著臺灣，另一則是操著舊統治者的「國語」，自成系統。陶晶孫的〈淡水河心中〉所書寫的臺灣，不僅是臺灣風土的描摹，同時也刻劃記錄了國府來臺的戰後初期臺灣社會所呈現的不協調面貌，正如文中智芙面對著民族與民族間的紛爭說道：「每個民族都覺得只有自己最偉大。事情就這麼簡單，卻沒有人明白。（筆者譯）」<sup>47</sup>就戰後初期的外省族群而言，臺灣人與其差別恐怕不僅是地域出身的差異而已，而是為異族統治過的「異民族」之存在。

---

<sup>45</sup> 陶晶孫，〈淡水河心中〉，頁98。

<sup>46</sup> 陶晶孫，〈淡水河心中〉，頁97。

<sup>47</sup> 陶晶孫，〈淡水河心中〉，頁99。

## 六、結論

陶晶孫的此篇臺灣書寫完成於日本，這篇小說可以說是此位「跨界者」的四年臺灣觀察記，見證了戰後初期混亂且重層的社會樣貌與意識型態。〈淡水河心中〉不只是陳素卿殉情事件的再現改寫，而是融合了作者陶晶孫對臺灣的理解，以及對戰後初期來臺外省人士心理的揣摩而成。他的另一篇同時期完成的日文散文〈蘭花の變り咲き：ある婦長の話〉（蘭花的驟變：一位護理長的故事）<sup>48</sup>中也生動的記錄了戰後初期臺灣社會之怪現狀，尤其是部分臺灣人如何與外省統治階層結合，名利雙收的模樣，其中特別記述了其任職醫院中一位臺灣出身護理長，在政治變動中如何迅速換回中國姓名，順利的以旅美歸國的菁英身分與外省族群合流，掌握權力的過程。這位護理長在日治時期和一般日本女性並無兩樣，且因為聰明伶俐而取得日本老師歡心，原本採用日本姓名的她，在戰爭結束後馬上恢復中國姓名，同時因上任局長不懂日文，權充局長翻譯的她便一躍進入權力核心。陶晶孫也感嘆的說道：「為了效忠統治者，不顧反對，一意孤行，結果成功的只有她。明明是本省人，但卻不能為本省同胞做事，實在很可惜。（筆者譯）」<sup>49</sup>

吳濁流在〈波茨坦科長〉以及另一篇小說〈狡猿〉中對於臺灣本地人如何迅速與統治階層結合的樣貌有生動的描寫，〈波茨坦科長〉中玉蘭的好友蕙英便是其中一例：

蕙英和玉蘭同是「鷗會」〔按：二戰時，日人組織臺人高女畢業生當特種護士之會〕會員，在特別看護婦時代一同被派遣到香港過，回臺後蕙英升為「鷗會」的幹事，勇敢地活躍著。出征軍人的歡送，遺族或傷病兵的慰問，獻金運動等，成為皇民奉公會的別動隊，常在臺上大聲疾呼地向民眾演說。那時的蕙英真是黃金時代。被目為臺灣女性的代表，芳名常出現於報章。可是時代使她的心境一變。以前她每天早晨在日本神壇前祈禱，如今神壇撤去，換上了孫中山先生的遺像。而且不知在甚麼時候把日本的服

<sup>48</sup> 陶晶孫，〈蘭花の變り咲き：ある婦長の話〉，《看護學》2（1951年2月），後收於陶晶孫，《日本への遺書》（東京：創元社，1952），頁79-87。拙文根據收於《日本への遺書》的文本。

<sup>49</sup> 陶晶孫，〈蘭花の變り咲き：ある婦長の話〉，頁86-87。

裝也丟棄，換上了華美的旗袍，這就是所謂光復姿態。同時陪伴她走路的人不是日本兵而是我國的軍官。<sup>50</sup>

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中，不乏這類具有時代敏感度的人士，陶晶孫在〈蘭花の變り咲き：ある婦長の話〉一文中也指出：「大體而言，她們這些精明的人理論上不會發現什麼，但多少都會察言觀色。（筆者譯）」<sup>51</sup> 除了這些快速轉換身分的臺灣女性外，吳濁流的〈狡猿〉中以戲謔的口吻諷刺了臺灣光復後社會中出現的「光復鄉紳」，小說中的江大頭在日治時期是一位不學無術成天被日警取締的地方流氓，光復後，搖身一變為鄉民代表，同時因為接收大量日產，因而累積了大筆財富，後又用錢買得中醫執照。小說中說道：「是的，是的。本省人是錢做人，不擇手段搶來的也好，祇要有錢就有人尊敬。」<sup>52</sup> 因為光復初期接收日產的混亂，除了來臺接收的外省統治階層外，也給了一些本省人大發「光復財」的機會，這些人在戰後初期成為統治的外省階級與本省人之間的橋梁，然而，由於素行不良而不被本省民眾尊敬，反而助長了統治階層與民眾之間的隔閡與誤解。這群臺灣出身的本省人正如陶晶孫所感嘆的一樣，同為本省人卻無法為本省人著想，只想成就自己個人的成功，戰後初期的臺灣交織著因時代改換而出現的種種風景，族群間的誤解、位階上的隔閡，以及一群等著榨取戰後初期資源的投機分子。

從陶晶孫的臺灣書寫中，可以看出臺灣特有的南國風情與生活於這塊土地的人們，在已定住日本的陶晶孫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對此，他也說道：「日本統治時代下的南海寶島上，日本人只知道教導種砂糖，卻忘了讚賞這塊土地的美麗，這是錯的。……我想藉此傳達生長在那塊島上的智慧、美麗與熱情。（筆者譯）」<sup>53</sup> 對陶晶孫而言，這個島嶼雖然僅是他游移與跨界人生的一站，然而卻能深刻觀察戰後初期臺灣社會的浮動與變化，並透過其作品記錄了所感。

從吳濁流的〈波茨坦科長〉到陶晶孫的〈淡水河心中〉都點出了戰後初期部分外省男子對臺灣女性的玩弄心理，以及部分臺灣女性對外省男子的自我理想投

<sup>50</sup> 吳濁流著、張良澤譯，〈波茨坦科長〉，頁 19。

<sup>51</sup> 陶晶孫，〈蘭花の變り咲き：ある婦長の話〉，頁 80。

<sup>52</sup> 吳濁流，〈狡猿〉，收於吳濁流著、張良澤譯，《波茨坦科長》，頁 79。

<sup>53</sup> 陶晶孫，〈蘭花の變り咲き：ある婦長の話〉，頁 87。

射之想像。從〈淡水河心中〉中可以看出陶晶孫企圖透過陳素卿的殉情事件揭開當時部分來臺外省青年與權貴的心態，透過對現實事件的逆寫，諷刺了當時輿論刻意型塑出陳素卿殉情案的浪漫色彩所淡化的省籍衝突，以及揭開這些浪漫敘事背後的政治操弄。另外，〈淡水河心中〉與殉情的社會新聞及其變成新聞事件的後續發展，有文本上的結構對稱關係：新聞的陳素卿與張白帆←→小說的吳少貞與陳不凡；新聞的評論與投書←→小說中的對談；公共輿論←→圓公園；臺大校長與教授←→臺大教授與助教等。甚至，殉情事件最後發展成臺大校長、教授們文言文投書中的「今見此事，昧昧思之，則遠古神話，頓識其義矣」，新聞事件在媒體形成的公共論壇與文教指導者們的推波助瀾下，變成了以今釋古，由俗歸雅的爱情神話。就文本文類的跨界而言，何為真實、何為新聞、何為虛構、何為小說，似已難辨。陶晶孫的小說，逆寫了比小說更像小說的殉情社會新聞。而作為民間輿論的「圓公園」，變成了逆轉由新聞媒體的報導、評論、投書，乃至編入教科書、民眾讀物等一系列的浪漫教化敘事，「圓公園」成為了以教化為目的的公共輿論塑造的重重堆疊文字包裹中，對抗性的真實民間輿論的場所。〈淡水河心中〉的「圓公園」，讓跨界者陶晶孫敏銳的察覺了戰後隨著國府的再中國化政策而形成的，在臺灣社會中存在著一條結合了省籍、語言與公共（官）／民的分界線。同時似乎陶晶孫也暗示著，這一條界線的存在，並非只是單方面的學習新統治者的語言與文字如同殉情者一般，即可跨越。畢竟，即便善語能文，卻終也淪為波臣，難逃一死。更不用說存在於官方輿論與市井街談巷議之間的鴻溝了。

## 引用書目

《中央日報》(微捲), 1950年。臺北: 國家圖書館藏。

《新生報》(微捲), 1950年。臺北: 國家圖書館藏。

《臺灣醫學會雜誌》, 1948-1950年。臺北: 臺灣省醫學會。

丁景唐(編選)

1995 《陶晶孫選集》。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中國現代文學館(編)

1999 《陶晶孫代表作》。北京: 華夏出版社。

吳濁流

1988 《無花果》。臺北: 前衛出版社。

1948 《ボツタム科長》。臺北: 學友書局。

1977 〈波茨坦科長〉, 收於吳濁流著、張良澤譯, 《波茨坦科長》, 頁 1-71。臺北: 遠行出版社。

1977 〈狡猿〉, 收於吳濁流著、張良澤譯, 《波茨坦科長》, 頁 73-176。臺北: 遠行出版社。

伊藤虎丸

1995 〈解題 戦後五十年と《日本への遺書》〉, 收於陶晶孫, 《日本への遺書》, 頁 209-239。東京: 東方書店。

佐藤春夫

1952 〈陶晶孫先生が遺著のために〉, 收於陶晶孫, 《日本への遺書》, 頁 2-3。東京: 創元社。

呂赫若

1947 〈冬夜〉, 《臺灣文化》2(2): 25-29。

李東華、楊宗霖(編校)

2007 《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集》。臺北: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杜聰明

2001 《回憶錄之臺灣首位醫學博士: 杜聰明》, 下冊。臺北: 龍文出版社。

金閔丈夫

1977 〈陶熾博士のことども〉, 收於金閔丈夫, 《南方文化誌》, 頁 33-38。東京: 法政大學出版局。

柯慶明

2009 〈五四: 印象與體驗〉, 《文訊》283: 85-90。

國立臺灣大學(編)

1947 〈國立臺灣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教職員錄〉, 《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錄》。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

張小紅(編)

1998 《陶晶孫百歲誕辰紀年集》。上海: 百家出版社。

陶晶孫

1951 〈淡水河心中〉, 《展望》7: 95-99。

1952 〈蘭花の變り咲き: ある婦長の話〉, 收於陶晶孫, 《日本への遺書》, 頁 79-87。東京: 創元社。

陶晶孫（著），曹亞輝、王華偉（譯）

2008 《給日本的遺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游鑑明

2005 〈當外省人遇見臺灣女性：戰後臺灣報刊中的女性論述（1945-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7: 165-224。

傅斯年

1967 《傅斯年選集》，第九冊。臺北：文星書店。

黃英哲

2007 《「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臺大同學會（編）

1947 《臺大同學會會員名簿》。臺北：臺大同學會。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編）

1946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各單位及臺北市各公共機關職員錄》。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鄭仁佳

1997 〈陶晶孫（1897-1952）〉，《傳記文學》70(5): 144-148。

鄭翼宗

1992 《歷劫歸來話半生：一個臺灣人教授的自傳》。臺北：前衛出版社。

龍瑛宗

2006 〈最近文學界一瞥：三三・三四年之事情〉，收於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六冊，頁 258-259。臺北：南天書局。

嚴安生

2009 《陶晶孫その数奇な生涯：もう一つの中国人留学精神史》。東京：岩波書店。

## **Boarder Crossing and Fiction: Social Phenomena of Postwar Taiwan in Tao Jing-sun's “Double Suicide at Tamsui River”**

Ying-che Huang

###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work: “Double Suicide at Tamsui River.” “Double Suicide at Tamsui River” written in Japanese by the well-known modern Chinese writer Tao Jing-sun. Tao Jing-sun (1897-1952) graduated from the medical School of Kyūshū University and was an active member of literary groups such as The Creative Society and The Alliance of Chinese Left Wing Writer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he served as the head of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Natural Science in Shanghai. In 1946, one year after Japan’s defeat, he assumed the Professorship at the Center for Tropical Medicine at Taiwan University in Taipei but later defected to Japan in 1950. In April 1951, he became an instructor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teaching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t the same time, he began his writing career and gradually gained public attention in Japan. Unfortunately, his literary career was cut short by his sudden death in February 1952. Most of his writings are non-fictional essays with only one short novel “Double Suicide at Tamsui River.” His works were collected in a volume titled: Final Words to Japan, which was published in October 1952 (Tokyo: Sōgensha). The second print was issued in December, and a third print was added in March 1953, all receiving rave review in Japan.

Tao Jing-sun’s life reflects the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 of many intellectuals of his time. With reference to his only short novel, which has not yet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this paper examines issues that were pertinent to the postwar Taiwanese society, such as colonial memory, cultural imagination and identity, and the crossing of linguistic boundaries.

**Keywords:** Tao Jing-sun, “Double Suicide at Tamsui River,” Postwar Taiwan, Boundary Crossing, Fiction, Colonial Memory